

珞珈山上社论：风暴中心的武大人，该如何自持？

=====

=====

近来，常有同学问我：“为什么网上总有人攻击武大，甚至连大一新生也不放过？”我不知如何安慰，只能实话实说：你并不孤单，我同样也愤懑不平，我们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感同身受的武大人。眼下的这份压力，我们共担。

很不幸，我们被卷入了一场无差别的网络风暴；不幸中的万幸，吾道不孤。我们还有彼此，还有珞珈山上的一草一木，可以抚平心绪；还有东湖的阵阵柔波，能轻轻卷走忧愁。当你被那些虫蝇般的声音搅扰时，不妨回望这片土地本身——奥操、老图、行政楼乃至东湖、珞珈山。它们所见证的，远比一时一地的议论更悠长，也更坚硬。

我无意歌颂苦难。当讨论不再基于事实、不再尊重理性，甚至不再保留底线，沦为对一所大学及其师生的无差别抹黑时，它就不只是舆情这么简单，而早已堕化为一场流量的狂欢，一场无意识的集体暴力。太多声音被情绪裹挟，太多判断让位于发泄——很遗憾，在喧嚣之中，坚持理性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

有些事，外界或许可以不了解，但我们自己作为武大人，应该清楚。我们站在真实的历史里，历史不会因为几阵风就改变走向，也不会因为几声嘈杂就失去重量。我们应清醒地回到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中，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正在哪里站立。

一、武大樱花从何而来？

“武大的樱花，不就是日本人种的吗？”近来，这样的声音尤为响亮。从起源看，此话并不全错。现今武大校园内的樱花，多为最初28株日本樱花的后代，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据校史馆吴晓老师表示，周恩来总理转赠樱花一说缺乏材料证明，即使存在转赠樱花，其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全部死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受赠的樱花则数量相对较少，长势与观赏性也不如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我们需要正视这一段历史，不能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歪曲历史事实。“樱花虽美，国耻勿忘”！

可是朋友，难道因此，我们就要自觉矮人一头吗？须知，历史的意义从不只在于“它是什么”，更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它”。

数十年前，武大师生西迁归来，面对这些侵略者的遗物，回想起国恨校仇，他们的心情何不复杂？也确实有不少人恨不得立即将其砍掉，然而，主张保留这批樱花树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为什么呢？或许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早已给出答案：面对旧社会的遗物，“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同样，面对这些日本樱花，我们也应秉持“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上，运用生物学知识，进一步培育良种，发挥其园林价值，推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化樱花。

砍掉这些樱花树很容易，却也可能抹去一段历史的罪证；留下它们，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智慧。

1947年的阳春三月，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张珽教授，直接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刚刚开花的樱花树下，他向同学们介绍，这些樱花“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为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没错，樱花就如同战士缴获的枪炮、抗战胜利后东三省的工业基础一样，是我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战利品”，照样可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如今漫步武大，三千余株樱花中，既有当年侵华日军所留下的“国耻之花”，也有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人相赠的“友谊之花”，还有本校的园林部门长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引进的各种纯粹的“景观之花”。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没有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没有武大一代代园林工作者们的辛勤付出，它们都不能开出如今这般繁盛的花朵。

花开花落，岁月无声，但武大人赋予历史的意义，始终鲜明。

二、除了樱花，武大还有什么？

或也有人质问：“那为什么不种梅花、桃花，偏要继续种象征日本的樱花？”

一则，武大何止有樱？梅园、桂园、枫园、杏园……四季流转，梅花、荷花、桂花、牡丹等各有其美。奈何好事者只愿看见樱花，便以为武大只有樱花。

二则，如前文所提，保留这些樱花，本身就是保存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是不会忘记那段历史。它们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这里曾发生过什么，而我们又是如何走过来的。

三则，当年直面侵华日军，留守护校的武大人与日酋周旋数年，早已主张过樱花之外需有梅花。

1938年7月，武汉沦陷前夕，王星拱校长决定留下以留日归来的汤商皓为首的五人负责看管校产。一开始，汤商皓再三推辞，但王校长仍“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最终，汤商皓被校长的“情辞恳切”所打动，决定“临危受命”，留守护校。

在日军强加樱花于武大之前，汤商皓恰与日军有一次交锋。当时，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便与留校同仁前来交涉。接见他们的是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

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栽种樱花颇有炫耀武功之意。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梅花乃中国国花，傲霜斗雪，有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之气概。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汤商皓的设想并未成功，但那份不卑不亢、守护文化尊严的勇气，早已刻入武大的基因。

1985年5月，汤商皓重返母校，行程结束后写下一篇感怀记，回首总结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汉护校，三年苦守，校舍无恙，幸未辱命。”

花木无辜，景无国界。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樱花之外，武大还有更多值得珍视的风景与精神。其实，武汉市市花即为梅花，“中国梅花研究中心”也设在东湖磨山。每当“雪压东云白絮飞”之时，在樱花大道的百米之外，正有着“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景象，激励着代代武大人不忘历史、战胜困难、昂扬奋进！

三、苦难不是“原罪”

近日，网传有一段文字写道“查了才知道，武汉大学是日军侵华时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并无端抹黑武大校徽，实在又是某些好事者博取流量的无耻之举。

根据已有资料，武汉大学主建筑群在日据时期确实被用作陆军病院和司令部，但从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武大即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官方资料显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2月14日由日军大本营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建制后组建，司令部设于南京；1939年9月4日日军大本营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9月23日撤销华中派遣军建制，所谓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一直设在南京。

纵览全网资讯，只能找到一本日军军官相册集，其上一张背景为老斋舍的黑白合影可略为支撑所谓“司令部”的判断。但这张照片的注释也只是写道“军司令部 各部 武昌（远是）”，并未指出这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而武汉在1938年10月25日才沦陷，那武汉大学又是怎么变成所谓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呢？恐怕是某些无良媒体一心想着吃“武血馒头”，忙着张冠李戴，却忽视了最基础的抗日战争事实罢。至于说“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只有武汉大学的樱花最多 连年盛开”，怕也是不知北京玉渊潭、上海顾村与南京中山陵罢。

再之，诸如污蔑武汉大学行政楼是日式建筑，武大校徽上的老图书馆图案与日本天皇头饰相似（实在不知相似在何处）的言论看似言之凿凿，实则对历史一无所知。

1928年夏，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中国地质之父）等人成立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1929年初，建委会聘请了毕业于美国建筑师开尔斯（曾获中山陵设计竞赛名誉奖第三名）为武大珞珈山新校舍进行总体规划设计。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乃是中西合璧风格，以“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风格为基调，同时融入了西方古典元素，并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结构等先进工艺，堪称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史上的典范之作。

2001年6月25日，“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与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等4处近代著名高校历史建筑一同入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更加说明了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所谓“日式建筑”“媚日”之说不攻自破。

固然，在武汉沦陷后，武汉大学由于地理因素被侵华日军践踏占据，但这绝不是某些人大吃“武血馒头”抹黑武大的借口。那段历史沉重，但绝非污点。北大红楼、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多少民族记忆承载之地，都曾历经黑暗时刻。这是民族苦难记忆的一部分，而非任何一所学校、一座建筑的“原罪”。将历史建筑的悲惨遭遇扭曲为肆意攻讦的理由，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四、西行，为文明而战；苦渡，以学术为舟

某些造谣者对武大的沉重历史大放厥词、肆意抹黑，可是谁又知晓在武汉大学这片热土上西迁乐山与国共合作抗日的故事？

或有人要提出质疑，“国难当前，为何不投笔从戎，偏要西迁办学？”答案很明显——“前方抗战固然重要，后方育人也不可少”。当时，王星拱校长说得很清醒：“我们不是要和日本兵拼命，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东京帝大，只要日本的大学还在上课，我们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战争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将来建国更需要人才，大学不能停办，念书也是抗战。”

1938年2月，第322次校务会议决定，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嘉定（乐山）。自3月起，千余名师生分批启程，陆续踏上了穿越荆楚大地与巴山蜀水的漫漫四千里征程，最终扎根乐山。

当时，王星拱校长送离大四毕业生，在《国立武汉大学第七届毕业纪念册》中撰序谆谆教诲道：“大学毕业，是个人生活历程中一件重大的事情；对日抗战，是我们民族复兴事业中一件艰巨的任务……只须我们有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毅力，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是无疑义的。只须我们不自甘于灭亡，任何人也不能灭亡我们。”

乐山时期，毫无疑问是武大校史上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八宝饭”里掺杂砂石、稗谷和虫鼠屎，“大统舱”宿舍中阴暗、潮湿又拥挤，死亡渐成常态。因日寇轰炸、物价飞涨、贫病交加、积劳成疾而逝去的师生，竟达百人以上。德胜门外的武大公墓，被生者心酸地称为“第八宿舍”。

乐山时期，同时也是武大师生不畏苦难、弦歌不辍、克难奋进谋发展的时期。哲学系乐山籍学生萧蓬父曾言，“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蛭蟥、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1943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访问乐山后，感叹“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并向全世界昭示“武汉大学科研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次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博士考察了20多所中国内迁大学的办学情况，评估武汉大学为“A等大学”“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大西迁师生们虽未处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但即使是在抗战的大后方，亦时常需要以同样的英雄气概去应对战争的严重威胁。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乐山半城焦土。但据当时在武大中文系任教的叶圣陶教授所言，“在日本飞机还没有飞走的时候，武大和技专的同学出动了，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扛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听到这个话，我激动得流泪了……那是教育奏效的凭证，那是青年有为的凭证，把这一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推广开来，什么事情做不来呢？！”

八载离乱，弦歌不辍。这份在苦难中保存文明、在绝望中坚守希望的毅力，正是武大精神中最坚韧的内核。

五、烽火燃江汉，珞珈立中流

对历史大手笔的真正体味，往往具有滞后性。在珞珈山上，也曾有一段国共合作抗日的佳话。这是一段被很多人忽略也不易表述的历史，这也是一段武大人应该知道也值得表述的历史。我查阅资料，静心重温，更觉厚重。

关于这段历史，有两处不可忽视的建筑——半山庐和十八栋。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为携手共谋抗日大计，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寓居半山庐，周恩来和邓颖超曾下榻十八栋。

1937年12月初，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武汉，入住武汉大学的半山庐，组织、指挥武汉大会战。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从延安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此时，因学校西迁而一度空置的“十八栋”迎来了新的住户，成为国共两党要员办公和休息的场所。

4月底，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从汉口太和街搬进武汉大学，入住一区20号（现12栋二单元）。不久，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搬入一区19号（现12栋一单元），与郭沫若夫妇成为同一栋楼的邻居。5月底，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从汉口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搬出，住进一区27号（现19栋一单元）。对此，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周恩来搬至珞珈山后，其住所很快就成为接待中外友人的中心，如埃德加·斯诺等各界人士来往不断。他在此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日，开展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统战工作，因而这栋小楼又有“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的美誉。

就在这座珞珈山上，国共领导人蒋介石与周恩来，依山毗邻而居，二人住所仅隔一道山坡。据周恩来当年随行工作人员童小鹏回忆：“那时周恩来和蒋介石都住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在抗战前途、民族命运等问题上，两人总是相谈甚洽。”

春夏之际，国民政府在国立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介石为总裁，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1938年1月至7月蒋介石在国立武汉大学内开办了两期高级军官训练团（珞珈山军事委员会战时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训练军官。中共长江局也以合法名义直接参与了珞珈山军官训练班的工作，向许多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战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珞珈山上一时英气勃勃，昼夜兢兢业业，惟恐疏虞”。

坐镇江城时，周恩来也十分关心武汉大学师生的成长与发展，在武大作了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等三次演讲（现樱顶大学生俱乐部即为第一次演讲地点，现九一二操场即为第二次演讲地点），鼓舞了师生们参与抗战的决心和夺取胜利的信心，引导进步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积极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这段复杂而真实的历史，恰恰说明了武大这片土地，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

六、在风暴中，保持定力与清醒

回到当下。当个别事件被无限放大，当情绪输出取代事实讨论，武大被推上风口浪尖。疑邻盗斧、捕风捉影，仿佛每一个贴着武大标签的东西，都必须被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一番。一时间乌烟瘴气、沉渣泛起，作为武大人，那份被曲解的苦涩、被辱骂淹没的窒息感，再真实不过。这份情绪，我们无需否认。

但此外，我们更需要超越情绪的定力与清醒。我们应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历史，去了解武大樱花、建筑、西迁和抗战的故事。

我们应清醒，现在并不全是武大的错。高校工作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面对欠妥之处，武大确实需有刀口向内的决心，反思自身的问题。但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裹挟“民意”，大搞运动式、反智式的抹黑批斗，更值得警惕。这一事件中，有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更多的是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对此，鲁迅先生早有洞见，他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写道：“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某些好事者以武大历史苦难作“汉奸的供状”，以谣言传闻攻讦国家重点高校，自毁教育长城，并“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倒是十分罕见的。尤其不堪的是涉及校格、人格的辱骂，仿佛不骂上一句便无法自容于中国，骂詈愈多，就愈能代表人民大众。真正的舆论监督，应该是基于事实基础，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充斥流氓习气的恐吓辱骂。

有理有据的事实论争，我们欢迎，毕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空穴来风的无端辱骂，我们则不必较真。某些好事者抓住普通学生便骂，与他摆明事实却又扬长而去，还自以为战胜，沉浸在践踏名校权威的快感中，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而面对网络阿Q，最好的办法便是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

大学的生命，从来不取决于一时一地的风评。请诸位放心，武大深厚的底蕴、百年的传承，不会因几句喧嚣就动摇分毫（或许还能筛选掉一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之人）。我们有两院院士这样的科学巨擘，更有无数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的热爱母校的校友。这些，是风雨吹不散、流量冲不走的根基。

一所大学的品格，从来不由网络热搜定义，而在于它培养了怎样的人，贡献了怎样的思想。武大之美，不仅在它的湖光山色、四季芳华，更在于它承载的历史厚度与精神自由。它是一所能够容纳争议、沉淀思考、在时代中始终站稳的大学。

所以朋友，在风暴中，我们尤其需要两种能力：

一是温润的定力，不为外界嘈杂而失去内心的尺度；

二是清醒的辨别力，不被情绪裹挟，保持独立与理性。

“学大汉 武立国”，这气魄，从来不在与人争一时口舌之胜。作为武大人，真正的回应，是回到历史中汲取底气，回到学术中锤炼真知，回到生活里去爱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让珞珈山这片土地继续生长着扎实学问、独立人格与人间的爱，便是对一切喧嚣最好的回答。

最后，在许多武大人的朴素言语中，我想分享这样一句话：

“网上很多人骂你，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你。但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知道，你很好，很温柔。这里的恬静，即使重来一次，你依旧是我坚定不移的选择。”

爱你，武大！愿在你的土地上，将永远有春之繁花、夏之欢别、秋之金灿与冬之清淑。愿我们都能在风暴眼中，保持内心晴朗、脚步稳健。因为你知道，山在那里，历史在那里，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都在那里。

愿珞珈常青，弦歌不辍！